

## 为了“不会反省的民族”（前言）

本多胜一

人类的确有共同的性格。

例如一提到在战争中的残暴行为，就想起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纳粹德国人，或是在中国和其他地方的日本军队，越南的美国军队，中央亚细亚的蒙古军队等等。这是侵略军方面的突出代表。但我们却不能说，哪一个民族（或是哪一个国家）经常是残暴的，哪一个民族绝不轻易干残暴的、侵略的事。也就是说，我们从任何民族都能成为凶狠残暴的魔鬼这一点看，任何民族都可能成为侵略者。这是人类的共同性格。

但是，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各民族有着不同的历史，他们之间当然也有着相当不同的性格。看日本近代史、现代史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显著的特点，这就是：他们始终没有用自己的力量，从根本上推翻过自己的政治体制。在天皇的名义下，不管干什么事，是始终没有被彻底否定而被推翻过的。即使推行军国主义路线曾使亚洲有那么悲惨的遭遇，对于受国民瞩目的甲级战犯，在战后，我们也具有毫不在乎地让他们当总理的精神。

这种精神，有时有积极作用，对某些方面是有利的。要之，我们确实是“不会反省的民族”，比经常反省的民族可

以少转点弯。在“不择手段赚钱”时也有利。在棒球比赛时，“不管用怎样阴险的手段，把选手拉拢过来取得胜利就好”，这种风气一直不衰，这也和没有反省精神有关系吧。

可是，如果日本人要带着这种不会反省的精神，和世界其他民族友好共存下去，那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不会反省的民族”不仅得不到“反省民族”的尊敬，而且，从狭隘意义的得失观点——也就是对日本人生存下去是有益还是有害的观点来看，也是令人非常悲观的（我想，如果“不会反省的民族”确实证明自己生存下去，那就只好让它这样继续下去了）。

本书记录的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队在中国的暴行，而且都是犯有这些暴行的日本军人自己叙述的，可以说是他们自我批判的稀有记录。为什么稀有呢？那是因为，是在“不会反省的民族”中出现的。像开头谈到的那样，暴行本身并不是“日本人特有的东西”。可是正像负责编这本书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常务理事富永正三先生给笔者信中所说的那样：“……问题是那以后的处理。在德国，他们自己审判了纳粹战犯（不承认时效），开除了一切战犯的公职。美国在自己国家法庭审判了松米事件<sup>①</sup>的当事者加里中尉……（中略）与此相比较，在日本，曾被占领军决定开除公职的战犯，在这项决定不知是否已被取消的时候，就大模大样地回到政界，重新上台……”这种情况不就是“不会反省的民族”的“特征”吗？现在，对洛克希德疑案，我们也不能期待

---

<sup>①</sup> 松米事件是1968年3月16日美国侵略军队在南越松米村米兰部落对无抵抗能力的居民进行大量屠杀的事件。1969年3月，美国国内了解到当时有109—567个（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居民被屠杀，便对当事人加里中尉等进行了军事审判。——译者

日本国民们投反对票，而且，即使有反对田中角荣或铃木善幸的势力，那也只不过是自民党内派系之间互相倾轧的使人扫兴的举动而已。

“反省”是什么意思呢？那必须要用“行动”来表示。

“谢罪”是什么呢？那也是必须要用行动来表示的概念。如果不伴随行动的“反省”或“谢罪”下定义的话，那就只能是“免罪符”<sup>①</sup>而已。真的“反省”或“谢罪”，实际上是绝不可能轻松地就实现的。

10多年前（1971年）我去中国各地采访日本军队事迹的时候（写有通讯：《中国之行》），虽然是一个日本人，但并没有对日本军人所干下的暴行向中国人谢罪。为什么呢？因为面对哭哭啼啼地诉说当年亲人被日本军队残酷杀害的被害者家属，我只能表达对他们为我采访提供材料的谢意和谈谈我的感想。例如在南京那次，我是这样说的：

“在南京大屠杀的当时，我还是幼儿。正像你们所说的那样，作为普通老百姓的幼儿的我，对这些罪恶是没有直接责任的。从本质上说，日本的人民大众也和中国人民大众一样，都同样是受害者。因此，尽管同样是日本人的罪恶，但我认为，我本人是不应向各位请罪的。问题是，比起过去，我们更要注重现在。日本的一般人民在日本战败后过了20多年的今天，仍旧不知道日本人曾经在中国干了些什么，而且，在日本目前又有走向侵略战争道路危险的时候，如果我们对此什么也不干，采取旁观的态度，那么，这次我们就要负直接的责任了吧。对过去的军国主义的‘道歉’并没有什

---

<sup>①</sup> 免罪符是中世纪欧洲天主教对信徒发卖的据称可免除人世罪恶而升入天堂的符券。——译者

么用处，阻止日本现在走向军国主义的危险道路才是真正的谢罪。我现在来采访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就是为了阻止现在日本走向军国主义而采取的一种斗争方式。对于你们的合作，我表示感谢。”

前面谈到的富永正三先生，在上述信中对本书现在出版的原因也曾经作过如下的说明：

“……我们得到的认识是，首先，对自己犯下的罪行，作为实行者当然应由自己负责，同时要彻底追究罪行的命令者，还有制造这种局势的当权者的责任。在这里发表的这种手记就是基于这种认识而写的。这是在1955年前后写的手记的一部分。我们回国不久（1957年）由同一出版社出版的《三光》给予读者很大的冲击，而且得到共鸣。另一方面，也被指责为‘多么不知羞耻呀’，同时还受到了恶劣的干扰。现在，可以称为它的续编的新编《三光》又要出版了。出版这本新书的原因是什么呢？在全世界开展的‘反核’、‘裁军’的潮流中，高喊着在低发展下再建财政和紧缩财政的日本政府，却单单对防卫预算加以特别处理，显得十分突出，煽起了战争的危机感。另一方面，还出现了号召怀念‘军国日本’的《联合舰队》、《大日本帝国》等电影。同时，现任日本大臣公然宣称，‘金鸚勋章只发给武功超群的军人。’究竟日本在中国干了些什么？由我们这些干过战争暴行的人回忆当时战争的体会，来暴露战争的罪恶，使战争的罪过不再在我们第二代人身上重演，另外，控告当时使我们陷入那种局势的当权者——其余党至今仍然健在，也就是对现在的当权者的警告。这就是本书出版的原因。”

这种观点和行动——只有这种真正值得冠以“行动”之名的行为，才是真正的反省，真正的谢罪。在作为“不会反省

的民族”的牢固基础的“特性”之中，使这样的行动变为不是“稀有”的东西之时，我们日本人才能够在地球上和其他民族毫无逊色地并列。

真的反省。真的谢罪。真的行动。对出色地完成了这个行动的本书的笔者们，我们衷心地表示敬意。改变“不会反省的民族”的日子是否能来，取决于这样的幼芽是得以成长还是被摧残。

1982年7月20日  
(在北海道日高)